

309

五

讀者參考

ⓔ

博輯廣選

冷战结束后的
大国关系

炒股大王的秘决

传奇人物曼德拉

住进“总统套房”的大款

深圳的女人们

学林出版社

目 录

观察与思考

- 4 中国需要批判现实主义
 - 11 通货膨胀的成因及对策
-

天下事

- 16 冷战结束后的大国关系
 - 20 只有一个地球
 - 23 普惠制与最惠国待遇小介
-

经济生活

- 26 当今广告业透视
 - 33 拍卖对社会的影响
 - 38 炒股大王的秘诀
-

人物春秋

- 46 长江王——林一山
 - 54 粤女阿静闯京城
 - 59 我看梁实秋
 - 64 从囚犯到总统
——传奇人物曼德拉
-

世态风情

- 70 九十年代读书人的三种选择
 - 72 KTV 包房四姐妹
——女记者的手记
 - 80 嘿，北京人
-

- 81 住进“总统套房”的大款
-

婚恋与家庭

- 84 “真爱如默默春雨”
——吕丽萍访谈录
 - 88 王朔破例谈情说爱
 - 90 中美婚姻观
 - 94 未来中国家庭的十大趋向
-

文艺园地

- 97 现代舞在中国
 - 103 破译“天书”
——萧乾文洁若夫妇与
《尤利西斯》
-

随感录

- 106 “不要说话”
 - 107 “第四产业”
 - 108 谁能没有感觉呢?
-

科技动态

- 111 面向未来的“信息高速公路”
 - 116 世界四大科学谜团
-

中外书摘

- 118 犹太文化：落难者的创造
 - 122 深圳的女人们
-

新书架

- 129 《厂长经理实用文库》
-

港澳台之窗

- 131 听台湾人讲普通话
134 台湾妇女呼吁两岸制裁
“一国两妻”
-

国外见闻

- 136 访韩观感两则
139 德国人富而不奢
140 美国的课堂风格
-

九州方圆

- 142 中国城市土地分级
142 中国主要城市绿化覆盖率
143 中国大地原点揭秘
144 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为世界第
一大峡谷
145 我国新建五个卫星通信地球
站
145 我国将发展长江商业走廊
145 中国第三座核电站选址在江
西彭泽
145 我国首家人体组织库在苏州
筹建
146 武汉证券市场日趋成熟
146 满洲里市兴建北方“沙头角”
146 鹏城兴起“电召”风
147 深圳聘用留学人员冠于全国
147 首家“老板市场”在京成立

- 148 北京出现首家礼品回收店
148 东北人，快跳下“火炕”
149 大陆“美国城”在四川开建
149 南京秦淮河可望变清
-

改革信息

- 150 自由港：广州的新启动点
151 国有资产授权企业经营
152 国家拟改革大学制度
152 国家取消奖金税和工资调节
税
152 国家把事业单位推向市场
153 上海试行薪点工资制
153 个人购房最低价
153 我国将组建首家民办股份银
行
154 国家规定律师服务收费标准
154 我国将制定辞退法规
-

新论点·新见解

- 155 社会总目标及其实现途径
155 “小政府、大社会”：明智的
选择
155 权力进入市场的现象特征
156 改革利率须拿出勇气
156 当今伪科技的几大特点
157 钱学森提出“大成智慧学”教
育
157 对弗洛伊德的再评价
158 王蒙建议设国家文学奖
158 商业化、大众化和历史化是九
三文艺热点的整体特征
-

-
- 159 “复关”对中国书业的影响
159 新华书店应尽快恢复出版职能
-

补白

- 63 世界十大著名歌剧
79 爱因斯坦的风度
79 巴尔扎克的午餐
93 人生感悟
128 齐白石铁闸二则

- 133 香港制造业“空心化”与技术进步

- 133 港人对港币的叫法
135 警惕：十一种社会病
138 什么是世界文化遗产
-

幽默画 (96) (105) (117)

- 160 《读者参考》丛书 1995 年征订通知
-

《读者参考》丛书 博搜广选

副主编 林 雨

编辑：《读者参考》编辑部

地址：上海金沙江路长风二村 51 号 15 楼 1 室

邮政编码：200062

出版：学林出版社 地址：上海文庙路 120 号

邮政编码：200010

邮购：学林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地址：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邮政编码：200020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丹阳市新华印刷厂

印张：5

字数：18 万

责任编辑：金 辉

封面设计：朱 文

ISBN 7-80510-958-3/Z·62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定价：3.00 元

中国需要批判现实主义

杨 帆

社会世俗化：人的 自由与解放

社会世俗化，即神圣意义的丧失，社会从以宗教、神权、皇权、家族为基础，向以个人为基础转变；官方意识形态瓦解，政教分离，信仰与科学分离，意识形态与政策分离；伦理道德治国让位于法律民主治国；判断事物的主要标准，不再是“善恶”，即是否符合某种抽象的原则，无论它是绝对理念、上帝声音、宗教准则，还是领袖语录、道德说教，还是社会舆论、理论教条，而是以“真假”为标准。判断真假的主要标准，是事物的实用价值：有用的即真理，没有用的即谬误。真理的绝对性为相对性所代替，整个社会趋于实用化，实利化。实用化的明确统一的标准，是货币化的价值——金钱。当整个社会的价值标准统一于金钱的时候，世俗化的过程即趋于完成。

世俗化，意味着个人从神权、皇权、家族、道德伦理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各种身份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具有了平等生存、发展和追求个人欲望幸福的权利，从而焕

发出无限的活力和创造力。生存竞争，适者生存，天赋人权，优胜劣败，自由平等，民主法制，这样的价值观念由于符合人性本质，所以为那么多的人所追求。可以说，社会世俗化，是人的解放，生产力的解放和社会的解放。每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不发达国家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中，都要经过这样一个阶段，发生像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宗教改革这样的思想解放运动。

中国社会的世俗化和思想启蒙，从300年前明朝末年就开始了，到清朝末年、五四运动，几经反复。15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又一次把中国从计划经济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以走向现代化的思想解放运动。在15年里，代表社会正统的“原教旨主义”和集体主义道德模式，力图保持自己的阵地，新旧思潮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潘晓讨论”：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重复自由资本主义初期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

——“蛇口风波”：“淘金主义”，崇尚美国西部淘金的“原始积累精神”；

——中西文化大论战：批判传统文化，吸收西方价值观念；

代表中国新兴企业家阶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市场经济的现代化思想，与世俗文化潮流裹挟在一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原教旨主义”和传统文化虽然借助于行政力量，发动了像“反对和平演变”这样的一些思想批判教育运动，但是遭到了越来越强烈的抵制。最有讽刺意义的是，1992年所谓“干部挂职下放”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下去的干部多数是替地方跑买卖，找渠道，发展商品经济。最后在1992年，确立了以生产力为标准，不问姓社姓资的实用原则，“原教旨主义”，传统文化，连同社会一般伦理道德、信仰理想、教育艺术，终于一古脑地淹没在“全民大下海”的商业金融投机潮流之中。

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要用物质的力量来打倒。20世纪改革开放的中国，是物质的力量打倒了精神的力量。

历史与道德二律背反： 现代化的代价

经济学家于光远提出“一切向钱看”，中青报记者张建伟提出“能挣会花”，从经济角度看并没有什么不对的，无非是表示市场经济下经济的货币化和消费刺激生产而已；如果搞消费信贷，就不是先

挣钱后花，而是“借钱先花，挣钱还债”的问题了。从纯经济的角度，我们甚至要承认资本原始积累的进步性。实际上，“原始积累”已经成为中国暴富阶层的理论行动纲领。1992年以来，精英下海的确与痞子不同，他们的商业金融投机行为需要有理论做为支点，才能心安。于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血与火”，就成了指导行为的理论支柱。这对于熟读马克思主义的精英们，并不困难，只要换一个立场就行：马克思当年批判什么，现在就干什么。我有些同学，当年在大学时如此这般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现在一下海，尝到了当大款的滋味，反过来嘲笑：“马克思不公平，把资本给了西方，而把《资本论》给了中国。”——看来金钱的力量真是大得很呢！

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是无法抗拒的客观规律。每当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尤其如此。像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道德瓦解、人欲横流一样，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也出现了无道德、无秩序，历史与道德相矛盾的典型画面：当广大居民刚刚庆幸生活改善的时候，发现少数人已经享受到高档宾馆和豪华汽车，上万元一餐的酒席；越来越严重的通货膨胀，侵蚀着刚刚增加的收入，自由度的增加，意味着就业难，失业易；人们因腐败而愤怒；工人要求工作，农民苦于摊派；严肃艺术自我拍卖；在经济表面繁荣的背后，人们发现，农业、高科技、

基础工业、教育仍然薄弱，环境生态、社会治安甚至出现恶化趋势，政府行政能力和控制能力降低，伴随繁荣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看不出好转的趋势，人们对未来的预期甚至比现状糟糕得多，短期行为蔓延。在投机者看来，中国越乱形势就越好，就越能成为“冒险者的乐园”！

1992年，是中国社会世俗化基本完成的一年。“原教旨主义”最终失去了控制能力，姓社姓资最终让位于“生产力标准”即实用标准，社会各利益集团基本形成，为了自己的利益进行自觉的活动。计划经济“没有活力，没有动力”的弊病只局限于国有部门，而非国有经济已经生产了50%以上的工业产值，占新增产值和出口的80%，每年还要增加1—2个百分点。可以说，社会动力的问题，已经通过改革基本解决了。

经济的发展，最终会带动基础建设和教育文化的繁荣。如果我们能够在道德上容忍商业原则至上的话，我们会发现知识特别是实用知识正在升值：大款们开始掏钱买文凭，买书作为室内装饰，资助教育和文化，为子女付高额学费；外资企业以每月上千美元的薪金吸引中国最好的技术人员，稍有名望的学者可以得到国外基金会的资助，在港台发表文章，可以得到高于国内5—10倍的稿费；北京大学以智力和名誉入股，竟突破了国家规定20%的上限，达到合资企业总股份

的34%；靠智力协助企业策划金融游戏而发大财的精英，不乏其人，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欢呼靠高智力赚钱时代的到来；知识产权法的实行，为通过智力致富开辟了法制化的道路——一切似乎都不坏；只要经济发展了，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在社会世俗化的总背景下，中国获得了活力和发展，这是事实。在历史和道德的矛盾中，我们主要应该调整自己的心理，在一定意义、一定程度上，为经济牺牲一些道德，为眼前牺牲一些未来，为局部牺牲一些整体。

不择手段靠投机暴富： 社会世俗化的扭曲

然而，社会世俗化虽然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趋势，但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一定时期内要使社会付出文化、道德方面的代价。“自动纠正”是不可能的，需要强大的批判现实主义思潮和社会控制加以制约和整合。如果出现领导上的失误和失控，比如说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双轨制长期实行，在法制不规范的时候鼓励金融投机，不能有效制止腐败等等，这种代价就可能无限增大，甚至导致整个社会的长期失控与混乱。少数人暴富而大多数人趋于普遍的贫困化。当严重社会经济政治危机到来的时候，市场经济甚至会逆转，出现对社会的强力整合，社会为此将

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

1992年以来的中国，就出现了这种发展中的危机与繁荣赛跑的局面。

如果以1992年作为中国社会世俗化完成的标志，那么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世俗化出现扭曲，走向反面，积极作用下降而消极因素恶性膨胀，正是出现在这一年。

社会世俗化的第一个扭曲，是金钱标准代替一切标准，市场原则侵入禁区，成为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万能上帝”。

如果说，市场经济原则至今未能占领某些关键的经济领域，如国有企业不能破产，银行不能自负盈亏，利率是计划利率，贷款实行数量限制，中央银行没有独立的货币发行权，外汇不能自由兑换，进口管制仍然很强等等，那么，市场经济原则却侵入了行政、基础科研和教育、生态和外部环境、公安司法甚至国防这些禁区。财政养不起国家机器，要求“自筹”部分经费，加上双轨制长期并存，导致了严重的权钱结合和腐败现象。

金钱啊金钱！该去的地方你不该去，不该去的地方你偏去！

社会世俗化的第二个扭曲，是致富心理普遍的恶性膨胀，从逐步合理致富变为图谋瞬间暴富。

社会成员普遍追求富裕，希望赚钱，是正常现象。但是少数人暴富的示范作用，已经使过多的社会成员，渴望瞬间暴富。有人说，西

方也不断出现少数人暴富和破产。问题在于，中国的暴富者并没有承担相应的风险，因此特别有诱惑力和腐蚀性。长期存在的双轨制，不规范的金融股票期货市场，给追求暴富提供了场所。当英国、美国以金融大国作为其成熟和衰落的标志，台湾、日本检讨“泡沫经济”损害了经济竞争力，腐蚀了国民道德的时候，现代化发展初期的中国人，却普遍被金融投机吊起了胃口。

泡沫啊泡沫！你不仅使经济空心化，也使国民精神泡沫化！

社会世俗化的第三个扭曲，是为追求暴富，不择手段。

标志社会进步程度的，不是目的，不是成果，而是手段。财富多少不能说明社会的进步与否。你的财富是用什么生产工具生产出来的，是用什么手段取得的，才能衡量你的社会是否真正获得了进步。理想主义的最大悲剧，是误以为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以暴力手段取得政权的领导者，没有能够及时从革命意识向执政意识转变。领导者对传统文化精华的抛弃而采取“反文化”的态度，渐进改革使得双重体制长期并存，即计划体制的规则失效而市场的规则又不能确立，这都是中国社会出现无序化的原因。无序就无法择手段，不择手段就无法有序，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追求暴富的目的只要普遍化，社会就更加无法确立秩序。在追求

暴富者眼中，中国越乱，形势越好。追求暴富，也不可能择什么手段，正所谓“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靠诚实劳动得一般工资，靠超额劳动得奖金，靠正常投资得一般利润率，靠创造发明得超额利润，靠特殊天才可以获得垄断性的超额利润，这是一般的致富规律。除此以外，就是不择手段：靠行贿、走私、卖淫、垄断、欺诈，特别是侵占国有财产，最后是影响政策，搞通货膨胀，刺激泡沫经济，一夜暴富。

少数人暴富，带动 社会道德大滑坡

如果说正常的世俗化是改革开放的成果，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繁荣，那么扭曲的世俗化，如果不加控制和规范，就将在繁荣时酝酿危机，在自由中导致崩溃。除去经济政治社会方面的危机，在社会道德方面，中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滑坡。

道德滑坡之一：是非颠倒的判断标准

马克思曾经引用莎士比亚批判金钱的诗歌：

“金子啊金子！你这无耻的娼妇！”

你把真的变成假的，把丑的变成美的……”

社会世俗化在真、善、美三者中，是以真假标准为主，讲科学，讲实用效果的，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把科学变为金钱，金钱回过头来可以收买科学，真的就变成了假

的。不是吗？当金钱可以买到一切时，广告、新闻、文凭、学历、专利、身份、家庭、信誉，都会失去真实性的价值，更不用说屡禁不止的假冒伪劣产品了。当实用标准代替一切时，不仅真假标准遭到扭曲，善恶标准和美丑标准更加无法存在。只要有钱，恶的可以变成善的——金钱没有臭味，卖鸦片办妓院来的钱，照样可以赞助残疾人事业。丑的可以变成美的——庸俗低级的艺术比高雅严肃的艺术有更高的票房价值。老实视为无能，诚实变为傻气，挥霍视为潇洒，欺骗变为聪明，敢于不择手段发财成了魄力，门路比知识更有价值——在目前中国社会中，这类现象不是比比皆是吗？

道德滑坡之二：无道德感，无非感，无羞耻感

中国传统道德的一句名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近年来痛遭批判，认为是与市场经济原则相违背的——市场经济就是要言利赚钱嘛！此话的确有反功利的含义，但并不一定是反对谋利益，而是反对不择手段谋利益。君子取财有道，不发不义之财——市场经济应该比任何一个社会更重信誉，守合同，讲诚实信用。

现在，中国那些大发不义之财的人，拿资本原始积累的“血与火”来为自己辩护。在这点上，他们宁愿引用马克思而不愿引用马克思·韦伯，因为后者向我们证明：在资

本主义早期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价值观念，是勤劳、节俭、储蓄、创新，基督教徒们在向近代企业家转化的过程中，把宗教美德加以改造，形成了新教伦理。我们批判了多年的资本主义，并没有使对方变好或变坏，却使自己由起初拒绝吸收资本主义的优点，变成了后来盲目摹仿资本主义的坏处，这真是历史的报应！

既然金钱那么值得炫耀、追求、献身和尊敬，追求金钱的手段又那么没有限制，那么社会良心不泯灭，道德不堕落，才是咄咄怪事！从没有内省，到不知是非，到不顾羞耻，甚至形成一种逼良为娼的社会氛围——都是为了一个“钱”字。如果这个“钱”是用来谋生的，衣食不足不能顾荣辱，尚可理解，但如果只是为了暴富和不劳而获，就是社会病态——这正是少数人暴富带来的示范作用。

世俗化刚刚使我们摆脱了政治性的道德危机，比如整人、打小报告、假做好事、说假话空话等等，但又使我们陷入金钱的诱惑和腐蚀之中。后者并不比前者好多少，甚至可能是前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变态和发展。我见过不少“马列主义忠实信徒”们，昔日大反“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靠整人吃饭，现在却大搞投机资本，昔日教育别人大学雷锋，今日不择手段行贿，走后门。居然能够“和平演变”得那么自然，那么心安理得，如果不是早就

泯灭了良心，养成了不知羞耻的习惯，如何能够保持心理平衡呢？其实也不奇怪：具体行为不同，但品质相同——都是为了利益，不要道德良心，不择手段而已！

道德滑坡之三：软弱无力的道德评价与舆论监督体系

金钱的力量，不仅表现在渗入市场以外的国家管理体系，也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社会舆论。少数人暴富，当然是“笑骂由汝，好钱我自赚之”，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但是当财发到一定程度，自然需要一个有利于自己的文化氛围。于是就有企业对于文化的各种赞助。文人们早已撑不住面子，迫不及待地投入企业的怀抱。写文章的给大款总结发财经验，搞剧本的塑企业家形象，在剧本中加入企业的广告，搞美术的给大款设计广告，搞报刊最重要的业务是拉企业广告，只要有钱，真假可以不顾，搞理论的论证大款发财的合理性，搞法律的最愿意接企业的案子，因为标的大，提成多，不比给又穷又酸的老百姓干，没有钱赚——几乎所有服务业大概都有这个特点：大款们进而设立自己的研究所，高薪聘请知名学者、官员为顾问——所谓吃人嘴短，拿人手短，只要接受企业赞助，就很难不替它说话。国际惯例是设立科研基金，割断赞助者和被赞助者的直接联系，可惜中国不是这样。整个社会的文化，实际上都成为“大款文化”。如此发展下去，就可

能出现大款出钱购买选票，影响政策，使之有利于自己——比如鼓吹通货膨胀，以期在股票地皮投机上发财，鼓吹对富人减免税收，等等。

中国的传媒工具对于社会不公正现象的道德评价和舆论监督，是十分软弱无力的。这就使市场经济的不完善方面，缺少了重要的制约因素，于是邪人邪事就出得特别多。

批判现实主义思潮 必将在中国兴起

人类发展有两种动力：利益驱动，即所谓人性恶的一方面。于是有法律，有管理，有生存竞争，有市场经济。同时，也有善的一方面，这就是人类思想对于真善美的追求。虽然恶的方面成为经常性的基础性的推动力量，而且在社会转型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善的方面绝对不是无所作为的。实际上，人类对于真善美的追求，是在更高的层次，更深刻的意义上，在最为关键的历史时刻，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我们可以发现，在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伴随着批判它的思潮。莎士比亚这样的资本主义文艺复兴的巨匠，对于金钱至上的批判是非常严厉的；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这些批判现实主义的大师，直到空想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组成了批判资本主义的强大思想阵营。无论其具体主张如何，在客观上，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思潮，从根本上

说并没有阻碍资本主义发展，而是制约和规范了它的发展，促进了它的改良。

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伴随着相当程度的混乱和腐败而出现的。批判现实主义即批判资本和金钱至上，批判腐败的思潮，必然变得十分强大。其思潮渊源将是十分复杂和丰富的：有自由资本主义思潮反对腐败和垄断的，有民粹主义思潮代表劳动者的，有民族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有民族主义，也包括暂时退后的计划经济思想——如果它不是在朝而是在野，作为制约性的思潮，它的面目将会可爱得多。

以上各种思潮，将组成强大的批判现实主义思潮。代表在改革中相对受到损失的各个社会阶层，代表社会的良知和精神文明、道德理想 and 传统美德，揭露和批判中国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的不彻底、不完善、不道德、不理想之处，在市场经济已经充分发展并大势不可逆转的形势下，它将发挥积极的社会功能，这就是促进市场经济的完善和规范，使它能够健康地发展，而不至于过分偏爱少数既得利益者，而使大多数人受到损害。否则，将违背改革的初衷，引起社会动乱，破坏市场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在规则，最终使市场经济发生逆转。

正是：市场啊市场，批判你，你才能健康成长；娇惯你，你就会畸形或灭亡！

（摘自《视点》1994.7.8.）

经济学家吴敬琏谈：

通货膨胀的成因及对策

对通货膨胀价值 判断和后果估计

近年来，政府部门和经济学界对于如何看待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概括地说，有以下几种看法。

一种观点强调经济增长的优先性，认为通货膨胀没有大害，甚至有益。主要论据是：

——通货膨胀是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的现象，对此不应有太多的顾虑。而且，目前中国经济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供给内部的不平衡造成了瓶颈（交通、能源等）制约和物价上涨。加大对瓶颈产业的投资，促进瓶颈产业加快发展，只会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中国目前面临高速增长的难得机会，经济高速增长是要靠大力增加投资来推动的，决不能因害怕通货膨胀而失去发展的大好机会。

——目前中国城乡公开和隐蔽失业人数众多，因此我们面临的最大危险，在于失业增加和由此引起的社会不稳定，特别是目前大部分国有企业资金紧张，经营困难，如果它们停工停产、发不出工资，就

会更增加失业人数。因此，应当采取“就业优先、兼顾物价稳定”的方针。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则应当采取“松货币政策、紧财政政策”的政策搭配办法，用适度通货膨胀换取国有企业困难的缓解和失业人口的减少。

——目前房地产价格较之去年年初高峰时跌落太多，使上千亿元的资本被“套牢”，同时，股票市场“低迷”，对股市投资者打击太大，也不利于经济的繁荣和企业改革的进行。只有实行比较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才能使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复苏，并“再造辉煌”。

上述在一个时期中被大众传媒广泛宣传的观点主张优先考虑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保持市场繁荣，而不必对通货膨胀顾虑太多，更不应采取紧缩性的政策抑制经济潜力的发挥。如果居民对通货膨胀反应强烈，可以实行工资和存款利率指数化，但是坚决反对提高贷款利率和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另一种观点可以称为通货膨胀“无益论”或“有害论”。其理由主要如下：

——用高通货膨胀推动的增长

是低效率的,而且是不可能持久的。在当前的情况下,过热的投资和过高的消费在短时间内可以通过资源的过度利用(“疲劳使用”)实现实际总供给大于社会的总供给能力的“过度供给”,但资源约束和社会问题的出现最终会使经济增长难于维持。

——通货膨胀会造成国民收入再分配状况的恶化,引起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和社会关系紧张。最近的社会调查结果表明,目前通货膨胀已上升为社会不满的第一位原因。决不能大量发放低息贷款来解决城乡失业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而这一点,只有靠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和投资效率才能做到。通货膨胀造成资源错误配置和效率下降,因此,通货膨胀归根到底只会使就业问题更加难以解决。

——通货膨胀提高了改革的成本,加大了改革的风险,严重影响经济改革的顺利推进,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物价涨幅过大,首先不利于价格改革的深化,许多本应尽快出台的调整价格和放开价格的措施,被迫推迟或取消,1986年、1988年都是这样。物价剧烈上涨还会使原来不合理的比价复归和对物价行政管制的恢复。

——通货膨胀助长投机和寻租活动的发展,扰乱市场秩序,使1992

—1993年期间那种“气泡”现象死灰复燃。而各国经验都已证明,“气泡”现象只能使少数人发财和造成短时期的虚假繁荣,却会对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及人们的创业精神及一般道德面貌造成极大的危害。

总之,持这种观点的人们把高通货膨胀看作是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重要障碍,因此主张必须对它进行治理,把它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通货膨胀成因的分析

对于通货膨胀的主要成因,在政府有关部门和经济理论界都存在着多种看法。这种看法上的分歧隐含着对于政府应当采取的政策的不同建议。

一是“成本推进说”。这是在前一时期有广泛影响的一种说法。持这种观点的人们认为,近来中国的通货膨胀不是由需求推动,而是由成本提高造成的。他们说,主要是原材料价格、工资价格以及资金价格的上涨引发了后续产品价格的上升,进而推进物价总水平的上涨。

——从原材料价格来看,1993年在1992年上涨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大幅度上涨: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全年共上涨了35.1%;工业品出厂价格全年共上涨了24%;两项的全年涨幅均为历史最高水平。生产资料产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占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总额的80%以上。此外,由于进口依存度居高

不下和人民币汇价大幅下跌，通过输入型通货膨胀也推动了产品成本的上升。

——从工资价格来看，1989—1991年三年调整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尽管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劳动生产率也几乎没有增长，但是职工工资性收入却依然保持两位数的高增长速度，职工工资总额增长率1989年为11.5%，1990年为13.0%，1991年为12.6%，1992年银行工资性现金支出增长了25.5%。1993年以来这一趋势更为明显。

——从资金价格来看，目前国有企业自有流动资金比重不断下降，企业90%以上的流动资金来自银行贷款，银行贷款的名义利率（一年期贷款年利10.98%）超过了国有企业的平均盈利率（2%）。

据此，持“成本推进说”的人们的主张是：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措施，不应当是控制货币供应总量，而应当是提高增长速度和加强对成本的管理，这样才有利于提高“速度效益”和降低成本。

反对的意见：成本推进和需求拉动的分类本来就是相对的，我国经济中近期成本价格上涨从根本上说是由上期需求膨胀拉动的；当然，在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建立、国有企业财务预算软约束的条件下，生产要素成本的提高会造成货币超发，但是，这个问题只能靠推进改革和硬化对企业的财务预算约束来解决，而不能靠提高增长速度、追求

所谓“速度效益”来缓解。

二是“改革推动说”。持这种意见的人们认为：目前的通货膨胀是由于改革速度过快造成的。由于取消价格管制，使商品价格能够自发地上涨，由此引起通货膨胀的连锁反应。价格放开、公用事业（水、电、煤气）等价格的提高、外汇汇率并轨和实行以增值税为主体的税制改革，都推动了物价总水平的上涨。1993年，国家放开了2亿吨原来由计划分配的煤炭的价格，减少了用官价供应的外汇的比重，提高了铁路货运和某些公用事业的价格。据说1993年零售物价上涨中有百分之20—40是由价格改革或调整造成的。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的主张是：放慢财税、金融、外汇和价格改革，恢复和加强对一般物价的管制。

反对的意见：在这次通货膨胀出现时，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已经由市场决定，新放开和调整的公用事业价格，由于它们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有限，对物价总水平的影响不大。至于汇率并轨和税制改革，基本上只是通过形成人们通货膨胀预期间接地推动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预期只有在货币过量供应和需求膨胀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形成。采取慢改革的办法来克服通货膨胀只会起相反的作用。至于实行对一般物价的管制，充其量只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临时性办法，国际经验证明，长期采取这种办法来抑制通

货膨胀是无效和有害的。

三是常规的分析。比较多的经济学家采用现代经济学的常规方法分析中国通货膨胀的原因。他们认为通货膨胀，即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涨，总是由总需求较多地超过总供给造成的。由于总供给的变化在一般情况下比较缓慢，通货膨胀通常是由货币过量供应引起的。从1989年第4季度开始，向国民经济大量注入货币。不过由于中国正处在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这些货币被迅速增大的货币需求所吸收，在一段时间里没有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但在1992年，货币注入超过了经济的吸纳能力，通货膨胀压力在这年下半年开始释放。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1993年，按年初价格计算的社会总供给为35666亿元，比上年增长27.5%，社会购买力38270亿元，比上年增长28.4%。供需相抵，总需求大于总供给2604亿元，供需差率达-7.3%，为1989年以来最高的。

以上的分析，没有涉及货币过量供应更深层次的原因。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中国经济学家也列举了多方面的因素。例如：

——从经济发展的层面上说，中国面临上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在非农产业就业和要为成千上万城市失业人口创造就业机会的巨大压力，因此经济具有很强的投资冲动。

——国有企业产权界定不清和

无人负责的状况依然存在，因此，投资饥渴和消费饥渴依然困扰国有经济部门。大量的国有企业仍然靠国家补贴(银行贷款)维持。

——财政、金融体制改革滞后，造成预算赤字增加和金融秩序混乱。专业银行继续在负利率的基础上采用行政方法分配资本资源，使货币政策自然而然地具有扩张性。同时中央银行系统本身的缺陷，使它难于进行有效的货币总量管理。

——股市及房地产的收益率过高和“气泡经济”的发展，导致具有上千亿规模的投机资本的形成，增加了货币扩张的压力和市场的不稳定性。

——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一直未能合理设置，使宏观调控缺乏坚实基础。中央政府部门在改革中行动迟缓，无法使用新的方法与手段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地方领导则力求扩展本地经济，于是在冲击旧体制的同时，也在冲击宏观经济的总量管理。

根据以上分析，持这种观点的人主张：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一般应当采取偏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抑制需求，稳定经济。鉴于目前广义货币增长速度已经控制在可以容许的范围内，在近期内可将宏观控制力度稳定在现有水平上，不作大的变动。同时把工作重点放在改善宏观经济调控的方法和切实推进财政、金融和国有企业体制的

改革上。

不同的意见：在目前大好的发展形势下政府不应当为避免通货膨胀而采取紧缩措施，以致失去高速增长的大好时机。继续采取紧的货币政策，将会导致整个经济的“滞胀”，应当放松银根，促进国有经济复苏和整个经济的繁荣。

在目前条件下进行 宏观经济管理的方法

随着通货膨胀问题上升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我国政府在1993年6月采取措施治理通货膨胀，并且在1994年的施政方针中把保持经济稳定作为一项主要的内容。多数人都同意这一方针，但是对于如何进行宏观管理和抑制通货膨胀，应当主要采取哪些手段，对于经济手段之间的搭配关系以及使用这些手段的力度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在中国经济学界，有的人对于从1993年6月开始的宏观调控措施从总体上持否定的态度。赞同对货币总量加强宏观调控的人们，对于调控的具体做法也有不同的想法。

一部分人全称肯定地支持现在的做法，他们认为，国有企业由于缺乏硬预算约束，对利率变动没有响应性，因而建立在利率调节基础上的经济手段基本上不起作用，而目前在中国条件下，只有以行政手段为主的调控方法才是有效的。

另外一些人虽然原则上同意现

阶段仍需保留行政手段的运用，但他们认为不应单纯依靠行政手段。主张逐步加强经济手段的运用，用经济手段的宏观调控置换行政手段的调控。

是否需要加强经济手段的运用，在原则上似乎并不存在异议。即使在中国现时的条件，采取妥善方式逐步把实际利率提高到正值对于改善宏观控制和提高投资效率的有益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由于它涉及到有可能取得贷款者和有权力发放贷款者的既得利益，这一必要而合理的措施不能实行。反对者的主要理由，是目前相当多的国有企业已经陷入财务困难之中，利率的提高将使他们雪上加霜。这种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即对于那些由于本身不能控制的原因陷于困难的企业国家应该给予救助，的确给予充分的注意。但是持前一种主张的人们认为，救助这类企业的方式要有利于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改善。在他们看来，与其用负利率贷款进行隐含的补贴，不如用预算资金给予公开的补贴，即使把职工用“开门养”或“关门养”的办法全部包起来，也比用负利率暗贴要好。后一种办法，搞乱了全部资本的配置。当然，在实现利率合理化的过程中，还需要讲究“老贷款老利率、新贷款新利率”的办法对困难企业给予照顾。这些建议也是值得考虑的。

（摘自《瞭望》1994.3.2.）

冷战结束后的大国关系

袁 明

冷战结束，风云变幻，大国关系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兴衰交替，大势使然。目前大国关系的重新调整虽然还没有完全到位，种种舆论却已先行。

美国率先推出“大国的兴衰”、“历史的终结”、“文明的冲突”等代表性观点，从而推动了一系列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大辩论，试图给美国在未来的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定位。

对于欧洲，人们谈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将来是欧洲的德国，还是德国的欧洲？”

在亚洲，人们则密切注视着日本的动向：“日本将进一步‘脱欧入亚’吗？”

“读史使人聪明”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上个世纪末，在一场美国发动的重新分割殖民地的美西战争中，美国占据了菲律宾和关岛以及一个逼中国“门户开放”的政策，使美国在亚洲站稳了脚跟，奠定了其全球大国的基础；也是在上个世纪末，一场中日战争后，战胜国日本“脱亚入欧”，与当时的世界头号强国英国结盟，

日本开始登上亚洲乃至世界的舞台，还是在上个世纪末，德皇威廉二世公开提出“世界政策”，宣称“德国的货物，德国的知识，德国的勤奋要漂洋过海……”。在上世纪末崛起的美、德、日三个新强国，在20世纪的世界舞台上做了淋漓尽致的表演。

从上世纪末至今的100年时间里，大国本身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的变化。美、日、德在冷战后世界上的作用再度成为跨世纪的议题。与此同时，人们还在谈中国的崛起，谈印度的复兴，谈俄罗斯的未来。的确，在国际关系中，大国关系是影响全局的。大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决定了他们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份量。大国所处的地理环境、所具备的历史文化传统对其所在地区乃至整个世界有着重大影响。

目前，新的国际格局尚未形成，大国关系调整尚不到位，无论双边还是多边关系中都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在大国关系的调整过程中，以下特点值得注意。

练好“内功”

在处理国内问题和外交的关系